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期发展

黄其洪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三期是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下正处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回归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再次强调总体性视域，探索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又一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革命的道路，但是又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不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者，而是它的同行者和平等的对话伙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科学指南，保持理论清醒，加强理论对话，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ZX015）；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特优学科研究后期资助项目（21SWUHQZZ08）

【作者简介】黄其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5）02-0013-10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诸多富有成效的梳理和分析。如冯颜利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早期，其核心词汇为“革命”；20世纪中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鼎盛时代，其核心词汇为“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为现实，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了新动向。^{〔1〕}夏莹以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经典西方马克思

主义与1970年以后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在第一阶段资本逻辑作为看不见的手裹挟着全部资本逻辑的文化生产，这成为其显在的批判路径；在第二阶段，资本逻辑成为显在的逻辑，统御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张秀琴从思想史的叙事视角出发，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期以及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当代演变期。^{〔3〕}蓝江则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被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彼此分离的三个阶



段,根据历史时代的背景与变革,他将其划分为20世纪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1世纪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4]结合我国学界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我们大致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1923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8年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08年至今的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历史分期具有哪些特征,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历史嬗变?为此,本文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期划分及其趋势作历史的考察,揭示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特征,探讨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启示。

一、第一期: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般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主要来自英国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但如果要进一步追溯的话,则可以追溯到柯尔施。只不过,柯尔施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流派进行严格的界定,只是大致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更没有详细阐述它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中首先提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5]这一概念,并作了比较详细的界定。梅洛-庞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为两派:一是人文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二是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讨论了两派之间的分歧,特别凸显了人文主义,表明了人文主义倾向。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大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兴盛起来,后来传到了英国,与英国本土的文化唯物主义之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如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是谁、革命道路应该是怎样的以及无产阶级是如何诞生的等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争论。相对而言,英国本土的文化唯物主义更强调微观革命和个体主体性的生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宏观维度、科学分类的方法以及结构先于个人、结构对个人的规范作用。20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这些分歧和争论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西方学界乃至世界学界流传开来,而佩里·安德森也特别关注了这场分歧和论战,并把当时欧洲流行并传到英国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界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佩里·安德森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明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排斥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系统性描述的功能。^[6]

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经历了不断演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加引号的,指的是1923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欧出现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思潮,但是,对于这种思潮是否为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7]到了1997年前后,以王雨辰^[8]为代表的一些青年学者与以徐崇温^[9]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特征、对象等问题爆发了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青年人的观点获得了胜利,老一代的学者基本接受了年轻人的观点。2000年,徐崇温先生在他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不再使用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正式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流派,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具有活力的阶段。^[10]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终结了,现在应该关注与之风格完全不同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了,“告别欧陆,转向英美”成为新的研究潮流。^[11]也有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西方左翼思潮”而不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12]

对于大多数的国内研究者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更宽泛的,不应局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应包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和流派,这里的“西方”也不仅指代欧洲大陆,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后来,国内学界逐渐流行起一个概念,即“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Western Marxism),指代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大量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代20世纪70



年代之后的西方左翼思潮。^[13] 2017年之后,陈学明先生一再强调,2008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重大的理论转型^[14],我把转型之后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按照我们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1923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探究开始,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典型流派,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根据这一时期代表人物的理论阐述,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推崇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推崇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追求正反合、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辩证法,认为这种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同时强调对其他方法的使用,如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等。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西方社会时,通常将辩证法与欧洲流行的哲学方法结合起来,对后者进行部分吸收,并对这些方法保持批判的态度,从而凸显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地位。柯尔施就曾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全部资产阶级哲学,认为“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因此它们的方法“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15];他强调,现在应该去理解这种辩证法,把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进一步发展上。

第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往的观点常常认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仔细读他们的文本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在沿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凸显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对意识形态本身和文化符号进行了一种

环节化、细节化、体系化的研究,从而更加深刻、细致、具体地说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然而,这恰巧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的部分。他们提出了基本的原则,但是没有对这条原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进行环节性的具体展示,没有考察其中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三,强调总体性视域。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重总体性范畴,认为无论是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甚至是对人类历史的分析,都要从总体性的角度去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有一个章节就专门论述了“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是指一些具体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判断,而是马克思的方法,即总体性方法,而这种方法所追求的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16]虽然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探讨和强调的总体是有差异的,如有性格方面的总体、心理方面的总体、自我意识方面的总体、人类社会层面的总体、国家层面的总体、人性层面的总体,但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社会历史的维度,所以,这里的总体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的总体。

第四,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群体性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不仅本人是共产党员,而且亲自参与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总是在思考怎么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全方位渗透到西方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情况下,在西方社会推动或制造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意识到需要在意识和文化层面造反,需要重新唤醒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这种意识和文化层面的造反,除了需要个体的自觉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依靠政党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葛兰西曾指出:“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基本要素。”^[17]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应该为他们的利益革命,并积极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强调群体性的



革命运动，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1968年才爆发了遍及欧洲和北美的“五月风暴”。

第五，坚信能够找到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存在着一种总体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这种文明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对于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形态，是全面可实现的，资本主义终将成为历史。葛兰西曾表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文学批评的作用，它可以“为争取新文化而斗争，即新的人道主义、批评风尚、意见和带着美学的或纯粹艺术的批评的世界观而斗争”，“为新的生活方式而斗争”^[18]。霍克海默也认为：“作为一种关于能够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和如何消除这种状态的见解，这种关于未来社会的想法在通行的条件中不断得到更新。”^[19]毋庸讳言，在这个方面，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和发展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苏联持有好感，虽然他们在1956年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甚至后来出现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事件后开始对苏联有所反思，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

二、第二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大事件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风格、方法、特征、气质、主张上变得与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个事件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结束。该事件实质上是西方一些激进的青年在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对资本主义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行全面反叛，如倡导性解放、肯定同性恋、主张身体解放、打倒权威，以期实现彻底的个体感性自由。这些年轻人既受到14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激进的革命传统的影响，又受到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激进革命传统的影响，他们主要付诸身体和感性的造反，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激进传统推向顶峰。然而，随着革命激情的消退，社会动荡造成了诸多疑难问题，人们又开始

回归经验、常识、理性和秩序，甚至从呼吁“反对的权利”到提出“反对反对的权利”^[20]。总之，在1968年“五月风暴”消退后，西方社会的整个精神氛围变得不再那么激进和革命，而是将“乌托邦主义”和“理想主义”视为贬义词，开始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

第二个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上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处于攻势，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守势，一度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情形。资本主义国家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在改革，吸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经济、政治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建立很多国有企业，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但这些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纷纷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发展滞胀，另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法国的密特朗出于挽救资本主义的目的，先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束了自大萧条以来在西方流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此后，这股改革之风又波及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纷纷开始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进程，从而造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转型。这些政治、经济的转型也对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保守和温和。

第三个事件是阿多尔诺对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的系统批判。1969年，阿多尔诺出版了《否定的辩证法》一书，该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西方之所以会出现屠杀犹太人这种灾难，归根结底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造成的，因为这种辩证法通过正一反一合的模式追求同一性，必然会造成形而上学的恐怖、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而会造成对感性、个体、差异和多元的抹杀。阿多尔诺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强调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独一无二性。对海德格尔而言，每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会死亡的，Dasein是独一无二的“能存在”和“去存在”，个体的感性、身体相对于周围世界在价值和生存论上具有优先性，不应该遭到形而上学的抹杀。阿多尔诺坚决反对那种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认为



如果一定要有辩证法的话,也应该是捍卫非同一性或否定性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辩证法只能停留在它自身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否定的或辩证的环节,以此来捍卫感性、个体、差异和多元。^[21]阿多尔诺的观点引起了那个时代包括左派和右派的西方知识界的强烈共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强大的思想冲击。总之,第一个事件表征的是精神文化的转折,第二个事件凸显的是政治经济的转折,第三个事件代表的是思想或方法论层面的转折,三大事件相互激荡,导致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开始进入第二期。

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终结于2008年,笔者把它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 Western Marxism),其主要代表人物和流派有晚期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和第三代、奈格里和哈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巴迪欧和朗西埃等法国当代激进左翼等。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呈现出五大特征,与第一期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一对应的。

第一,公开抛弃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受阿多尔诺的影响,都认为必须抛掉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反对把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他们认为,如果需要使用某种方法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话,也只能用否定的辩证法,或者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哲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等。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那样坚持同一性的原则,他们认为要么用否定的辩证法,要么把否定的辩证法跟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去反思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方法论上的明显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当作批判的对象,甚至人人喊打。

第二,不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要么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讨论问题时不再使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而是完全在另外的话语体系里去讨论问题。其中,哈贝马斯就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1976年,哈贝马斯写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斯大林将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了,使历史唯物主义受到理论框架的禁锢,因而需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这种重建是有希望的。^[22]此后,他几乎是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系统来论述。另外,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阐述了“解构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并肯定了解构主义批判的优先性。^[23]柯亨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陈述中有很多歧义,因而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主义重建。^[24]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时期是作为反动的教条而被抛弃了的。

第三,不再坚持总体性视域。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追求总体性,他们认为追求总体性本身必然导致那种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回归,进而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恐怖,造成对个体、感性、多元和差异的抹杀。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砸掉一切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延异、撒播、游牧、星丛、链接等概念。如拉克劳和墨菲曾指出:“我们把任何建立在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25]换言之,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社会和历史不再是一个受必然性逻辑支配的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在偶然性逻辑下的话语链接的实践活动。总之,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坚持总体性视域,而是以微观的批判取而代之,关注环境、性别、生态或某些领域的正义问题,从总体批判进入微观批判,不再强调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

第四,不再认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对无产阶级政党持怀疑态度。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消亡,不应该再以阶级的方式进行革命,而应该是以个体的方式、付诸身体或各自理论的方式进行革命。如果说还要进行某种群体性运动的话,那仅仅是经历某种事件。需要注意的是,“事件”(event)一词在这个时期非常流行,它来自海德格尔。^[26]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中,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事件开启时间,时间设定空间,空间展开意义,意义打开世界。对于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们经历某种事件,仅仅表明人们在这个事件中进行一种临时性的链接,成为临时性的多元主体之一,而事件总会结束,当旧的事件结束之后,新的事件又会到来,新的、临时的、多元的主体又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无产阶级主体和稳定的无产阶政党,有的只是事件主体,只是不同身份的人因为事件而临时连接起来进行斗争。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事件斗争取代了无产阶级斗争。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无产阶级已成为一种神话,它已经不复存在了。^[27]

第五,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不可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效能降到负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执着地反对权威,反对国家,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生后,他们变得更加保守,将“乌托邦主义”和“理想主义”视为贬义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被超越的“超级现实”。“超级资本主义”“普遍资本主义”这些概念在这一时期很流行。晚期阿尔都塞曾指出:“当今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为一个梦。”^[28]此外,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该书在西方左派知识界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福山强调: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因此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29]。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左派只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局部改良,具有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征。

三、第三期: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2008年之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加速演变的历史新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转型,即由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Neoclassical Western Marxism)。之所以将2008年作为第二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点,主要是因为2008年前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分别是“东升西降”的大变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非哲学运动和思辨实在论运动的出现。

第一个大事件是世界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大变局。2008年有两件大事共同导致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一个是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西方世界经历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至今仍未恢复元气。尽管如此,西方还力图把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在这一时期,凡是移植了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比如阿拉伯之春)。这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已陷入严重的系统性失灵。因此,此次危机不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灾难,暴露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和脆弱性,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伴随此次危机而来的不仅是失业人口增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难民危机、欧洲债务困境、民主体制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且全球经济遭遇逆全球化浪潮,文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思潮甚嚣尘上。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围绕金融资本的逻辑、全球化下的阶级关系、当代西方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思想事件。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域和辩证法传统,在危机爆发后得以重新激活。

另一个事件是2008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磅礴的生命力。首先,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再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等多种类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自2008年以来,在全球治理难题错综复杂、全球公共危机频发的背景下,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危机重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遭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赢得了包括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广泛认同。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其深度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中任何新兴的全球大国。”^[30] 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出来的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活力，尤其是为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而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已经逐步得到西方左派的高度认可。中国的现代化避免了西方大多数国家出现的个体原子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中国在应对腐败、不平等、气候变化等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时，比西方更有优势，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希望。可以说，“东升西降”的国际大变局，导致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曾经持有的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可以替代资本主义。

第二个大事件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革命，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融合实体世界与数字世界，在数字空间中实现各种形式的存在，从而模糊了传统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在诸如元宇宙、Sora大模型、在线游戏、数字孪生等虚拟空间中，数字技术使许多原本只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实体通过数字形式存在和展现，也可以完成从简单的自动化任务到复杂的决策支持系统，并生成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虚拟角色。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世界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存在”的定义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存在本质的传统理解，模糊了物理存在与数字存在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使非存在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究竟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非存在？究竟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第四次科技革命实际上把人类推到一个全新的困境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和塑造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虚拟世界中的存在是否具有某种形式的真实性和价值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延续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经验分析和微观分析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换言之，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需要我们重新回归一种总体性的思考方式，甚至重新回归形而上学和辩证法。

第三个大事件是非哲学运动和思辨实在论运动的出现。在2008年前后，欧洲出现了两场思想运动，波及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这进一步导致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研究范式上的转化。第一个是非哲学运动（Non-Philosophy）^[31]，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拉吕埃勒。非哲学运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诸多理论贡献，其中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的就是拉吕埃勒对辩证法的研究。简单说来，拉吕埃勒提倡一种单边决定（unilateral decision）的、多元对立的、内在统一的、横向超越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指向的是唯一一个实体，即实在一元（the Real-One），它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哲学范畴的实在，是辩证法的起点和归宿。^[32] 拉吕埃勒的辩证法既不同于前概念的辩证法，也不同于康德和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还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单边决定的辩证法旨在号召人们打破各自的知识、文化和宗教界限，以对话交流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挑战，面对各种可能的世界，以一种激进的理论民主主义实现各种文化形式、哲学理论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从而为探索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新文明类型奠定理论基础。尽管这种辩证法也追求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不是实体的同一性，而是指向的同一性；不是纵向的超越，而是横向的超越；不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是一种多元要素之间的彻底平等。我们可以说，在当代西方学界，辩证法的概念及形式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

第二个是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运动，以昆汀·梅亚苏、格拉汉姆·哈曼、雷·布拉西耶与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为代表，他们重点关注“存在什么”与“如何存在”的本体论问题^[33]，一致反对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共同承诺“形而上学思辨与强有力的本体论的实在论”，并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研究的尊严”^[34]。思辨实在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合理的，只不过需要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把人类历史放到前先祖性和后人类性的脉络中去思考，既要看到其中的必然性，也要看到其中的



偶然性。因此,思辨实在论把对历史的反思提到了一个新的本体论高度。比如他们提出“资本世”(Capitalocene)^[35]概念,认为资本世已经深刻改变了地球,而且资本世如果得不到克制,就会导致“人类世”(Anthropocene)^[36]的终结。显然,这是一种新的总体性的思维模式,只不过,他们思考的总体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甚至也不再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而是存在的总体和文明的总体,甚至是星际的总体。

哈曼强调,自笛卡尔、培根以来,西方哲学一直存在着一个教条:在人和世界的先在关联中去思考人和世界,只关心现象界的存在,而不去关心现象界之外的世界自身,不关心那种外在于人、先在于人的绝对存在。思辨实在论恰恰是对这种教条的超越。在哈曼看来,传统的朴素实在论所强调的实在是一种在我们的精神或思想之外的常识性的实在,它是局部的、可经验的,可以被人的直观把握到。而思辨实在论所强调的实在,却是一些陌生性的经验,它不能被我们的直观把握到,不能被我们的知觉经验到。它具有总体性,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拉开一段时间间距,需要借助一种勇敢的想象,才能够被我们理性推断出来。^[37]因此,这是一种理性的、想象中的实在。至于为什么这种在理性中想象的实在如此重要,可能的原因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去设想一种与当下的“超级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在我们看来,思辨实在论不仅是一种理论的转向,它还是对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虚无主义问题、相对主义等问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策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形而上学”^[38],就是把西方文化从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通过重建一种比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更加多元、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形而上学,来拯救整个人类的文化危机。

立足于对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认识,从它的研究范式和问题逻辑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特征。

第一,再次重视辩证法,但是对辩证法进行了改造。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像第二期西方

马克思主义那样要么完全将辩证法束之高阁,要么主张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而是主张一种追求同一性的辩证法,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同一性已经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同一性,而是指向意义上的同一性;辩证法内部各环节之间已经没有立体的、必然的逻辑联系,而是一种横向的、偶然性的关联;已经不再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体系,而是通过单边决定形成一种新型的本体与环节之间的关联。很显然,经过拉吕埃勒改造之后的辩证法,也不同于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法,他们用一种指向意义的同一性替代了实体意义上的同一性,用横向的偶然关联替代了立体的必然关联,用单边决定的模式替代了相互作用的模式,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第二,再次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拓展。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像第二期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要么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么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反他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其适用性,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前先祖时代和后人类时代,拓展到星际的和文明的层面,拓展到超客体领域,同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下容纳了偶然性的因素,使偶然性、多元性、差异性等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成为还原历史复杂性的要素,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和现实性。

第三,再次强调总体性视域,将总体性进一步提升。如上所述,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总体性,但是他们强调的总体性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他们强调总体性的目的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文化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而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形而上学的恐怖的反叛,基于对个体性、多元性、差异性、偶然性的强调,他们完全放弃了总体性视域,仅仅停留在微观分析和微观批判之中。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再次强调总体性,另一方面又对总体性进行了提升,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或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内部,他们所说的总体是存在的总体、文明的总体和以星球为单位



的超客体的总体。

第四，再次强调统一的、有铁一般纪律的政党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如上所述，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否认了政党的领导作用；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建党原则上比较注重自由原则，他们的政党理论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建党原则的影响。与他们不同的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立场是激进的，具体表现为新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再次复兴。他们自觉地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毛主义的游击战争策略。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强调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铁一般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标志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典型事件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成立。2024年2月26日，美国革命共产党在纽约宣布成立。美国革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铁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强调拿起武器打游击，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对美国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进行破坏。它的成立标志着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激进化。

第五，再次坚信资本主义将在总体上走向崩溃，并且积极探索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与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将在总体上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的，不是历史的终结。比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指出：“21世纪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僵尸体系，在实现人类目标和回应人类情感方面似乎已经死亡。”^[39]但与第一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要想超越资本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而是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文明类型。尽管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描述出的新文明类型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是都共同地包含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新文明类型或多或少都是社会主义的。他们在思考新文明类型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吸收了营养。

总之，自2008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主题、研究方法、理论范式、政治态度等方面

均发生了重大转型，进入重新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地位、再次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再次重视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努力重建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积极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类型的新时期。对这种重大的转型，中国学界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而不能继续以老眼光来看待和研究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四、结语

在我们看来，由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很多难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面对的，有一些问题可能在中国更加典型，所以，我们已经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历史的同行者，而不仅是理论的同时代人。这与我们国内早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处的境地是不一样的。他们当年在研究第一期和第二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明显的历史间距，这些理论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也确实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种状况在研究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期或者说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今后我们在进一步讨论这些理论家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强调他们的“西方”属性，无论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40]我们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不再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者，而是它的同时代人和对话伙伴。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能再以西方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为基本框架来建构我们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我们自身的历史使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科学指南，深入、全面地分析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加以鉴别，保持理论清醒，加强理论对话，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冯颜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与新动向》,《人民论坛》2020年第32期。

〔2〕夏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3〕张秀琴:《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3页。

〔4〕蓝江:《从物化批判到数字资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历程》,《学术界》2021年第4期。

〔5〕〔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6〕〔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文贯中、魏章玲译,高铨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66、96页。

〔7〕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8〕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

〔9〕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10〕徐崇温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1〕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2〕张一兵:《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突围与坚守》,《人民论坛》2015年第9期。

〔13〕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14〕陈学明:《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5〕〔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1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8页。

〔17〕〔1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459页。

〔1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7页。

〔20〕徐崇温:《“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88年第7期。

〔21〕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by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p.12.

〔2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23〕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rans. by Peggy Kamuf,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86.

〔24〕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xvii.

〔25〕〔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26〕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trans.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Daniela Vallega-Neu,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6.

〔27〕〔28〕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105, 193.

〔29〕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xi.

〔30〕〔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40页。

〔31〕〔英〕雷·布拉西耶:《自明性的异端——弗朗索瓦·拉吕埃勒的非哲学》,黄其洪、王鸿宇译,《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32〕黄其洪、袁雄:《论拉吕埃勒对“实在”的非哲学阐释》,《求是学刊》2023年第6期。

〔33〕〔澳〕德维特:《实在论与真理》,郝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5页。

〔34〕Steven Shaviro, *The Universe of Things: On Speculative Rea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5.

〔35〕Jason W. Moo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akland: PM Press, 2016, p.81.

〔36〕Paul J. Crutzen and Eugene F.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 Newsletter*, no. 41 (2000), pp.17-18.

〔37〕Graham Harman, *Quentin Meillassoux: Philosophy in the Mak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VII.

〔38〕〔美〕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39〕Chris Harman, *Zombie Capitalism: 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0, p.12.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责任编辑:李凡〕



学人风采



黄其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拉吕埃勒与思辨实在论、移民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重建。在《哲学研究》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10余篇，其中SSCI论文1篇、CSSCI论文6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文摘转载27篇次，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专著6部，主持包括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各级各类项目38项，荣获包括重庆市社科奖在内的各种学术奖励3项。

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文科二级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委托课题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政党治理、国家建设、公共政策与历史政治学等研究，提出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政治势能”理论和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专著《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同时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被译为多国语言。



程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特邀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委法律顾问、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不动产法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法等。参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大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起草论证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侵权责任法（第三版）》等专著十余部。先后荣获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国家与省部级学术奖励。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On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Huang Qihong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Classical Western Marxism, the second period is Post-Marxist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third period is Neo-Classical Western Marxism. Currently, we ar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hird period of Western Marxism. They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of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ce again emphasize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new types of civilization, stress the role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and emphasize the revolutionary path. However, it also has many new features. It is certain that we are no longer blind followers of the third period of Western Marxism, we're its contemporaries and equal dialogue partners. This requires us to clearly define our own historical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ak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s a scientific guide, maintain theoretical clarity, strengthen theoretical dialogue,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on the Value and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Dang Shengyua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provides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guidelines for thinking about and interpreting the value and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es o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his elabor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rovide a concrete methodological pathway for us to engag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ideological space and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Throughout its over 5000 year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created and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literary thought characterized by theoretical richness, diverse form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Through which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have been forme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heritage now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resource for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value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ave rooted in pre-Qin Confucianism and integrating Taoist and Buddhist philosophies, it has evolved into a cohesive yet dynamic community, rich in intellectual and aesthetic wisdom.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follow the methodological pathway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research and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value and ideology, within the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endeavor should be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